

传承与超越

Inheritance and Transcendence:

Study on Functionalist Skopos Theory of Translation
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研究

卞建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传承与超越

· Inheritance and Transcendence:

Study on Functionalist Skopos Theory of Translation
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研究

卞建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承与超越 / 卞建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9

ISBN 978 - 7 - 5004 - 7221 - 6

I. 传… II. 卞… III. 翻译理论—研究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5708 号

责任编辑 高 涵
责任校对 王雪梅
封面设计 杨 蕾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980 1/16

印 张 19.25 插 页 2

字 数 333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卞建华的博士论文，经过两年的修改，要出版了。我表示祝贺，并应邀写几句话，算是一篇序言。卞建华是山东人，承孔孟遗风，赴天津求学，先是在天津师范大学读硕士，然后于2002年入学南开大学外语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品学兼优。她的研究范围本来是比较广泛的，经与崔老师商议，确定为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评述与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我以为是恰当的。事实证明，卞建华完成得很好。她本来就是天资聪颖，又很勤奋，收集资料详尽，学术交往也及时而广泛，论文写作顺利，答辩效果自然良好。求学期间和毕业以来，已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可谓成果辉煌。作为建华的任课导师，我也为她的学业取得这样的成就而高兴，故而不顾时间仓促，写了如下的话语，与学界共勉。

—

德国功能主义目的论的翻译观，是20世纪70年代末，继语言学派形式主义的翻译观以后，综合了众多学科，吸收了多种来源而形成的一个有重大影响的翻译学派。它注重功能主义与社会文化因素，注意吸收和借鉴交际学理论、行为理论、篇章语言学和话语分析理论，以及文学研究中侧重于读者和读者接受与反应的理论等，终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与理论流派。虽然在一开始目的论翻译理论有实用的倾向和注重应用文体的侧重，但后来在发展中也逐渐进入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之中，从而发展为一种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但不乏综合性和普遍性的翻译理论。

翻译并不是被视为语码转换的过程，而是人类一种具体的行动。翻译和人类其他行动一样，也有其目的，而“目的”一词（skopos），则来源于希腊语，遂用作翻译的目的而成为一个技术性术语。在翻译开始以前必须首先确定其目的（skopos）；在强调目的的时候，这一理论便采取了前瞻的态度来对待翻译，而不是采用后顾的态度来对待翻译，即基于源语文本的规定性的理论所采用的后顾的态度正与之相反（*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edited by Mona Baker, assisted by Kirsten Malmkjaer,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 235)。

建华的论文题目是《传承与超越：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研究》。她系统地介绍了德国功能主义目的论翻译理论的理论渊源和学术背景，逐个分析了其代表人物赖斯、弗米尔、曼塔利和诺德等人的理论主张和主要观点，总结了这一理论在西方学界的批评与反批评，考察了该理论的“中国化”过程 and 在中国的接受与批评，体现了明显的理论批评意识和不懈的学术探索精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中将功能学派的有关文本处理的理论主张和中国的变译理论进行对比研究，其分析的思路和结果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她还参照功能理论的翻译教学观对中国外语教学加以反思，分析了其中的差距并提出改进的途径，显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扎实学风。如果说这一研究还有待改进和提高的话，那就是学术批判的纯学术高度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而在理论评价标准的一致性方面也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不过我相信，在这次出版修改的过程中，作者已经做了诸多的改进和提高，相信读者诸君自有慧眼识得，恕不一一指出。

学术交往是学术研究的社会性前提，对于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推进和保证作用。因此，另一个重要的学术事件，同时体现学术活动所必需的社会性的一面，就是建华邀请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第二代代表人物诺德（Christiane Nord, 1943—）教授来华讲学一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建华已经从南开大学毕业在青岛大学工作的第二年，即2007年，她邀请诺德于同年3月3日至17日来华讲学。实际上，此前，2006年1月，诺德曾应香港中文大学之邀，在香港讲学两周。这次的大陆之行，可以说是香港讲学的继续，却是一次独立的学术交流活动。这次的“克里斯蒂安·诺德教授中国学术交流之行”，是由南开大学和建华所在的青岛大学联合主办，由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天津外国语学院、天津理工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和青岛科技大学鼎力协办的。来华期间，诺德教授先后在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南开大学、天津外国语学院、天津理工大学、中国海洋大学、青岛科技大学和青岛大学举行了系列学术讲座和座谈。诺德讲座的题目包括：《作为目的性行为的翻译：功能主义目的论阐释》、《文本功能——翻译功能：翻译的四种功能模式》、《奇境中的茶点时间：文学翻译中的功能主义》、《译者培训：解决翻译问题的系统方法》、《译者培训：学生译文评估》。座谈内容涉及到功能主义目的论的哲学基础、对译文接受者的实证研究、翻译的目的、功能

主义目的论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文学作品的文学性与翻译目的之间的关系、翻译标准的多样化、双语能力与译者培训的关系、译者培训的过程、自译中的忠诚原则、决定忠诚原则的重要因素、译者的责任与地位等问题。关于这次来华讲学的印象，诺德在其他地方曾有过明确的表达，这里不再赘述。

正是在这样一次重要的学术交流活动中，诺德显示了一位德国学人的学识与风度。她使我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位真正的学者，必须具备卓越的学识、良好的人文品质，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这和传统意义上的“传道、授业、解惑”（韩愈语）的师道，既有联系，但仍然有一些区别。我本人也在听讲座和座谈的过程中，获益匪浅。现在回想起来，可以说经过一些直接的接触和交流，完成了对德国功能主义翻译学派的认识从书本知识到直观认识的一个过度和上升。以下简要陈述一下自己对德国功能主义翻译观的认识，与学界同仁共同讨论。

二

功能主义和目的论的翻译理论，为何会出现在德国？要回答这一问题，我首先想到的是德国民族的学术精神与功能主义翻译观产生的文化基础。关于德国的学术精神，必须先提到德国人的知识精英意识。德国的知识分子有一种精英意识，在精神上高居于一般普通大众之上，追求卓越与超绝，极端者追求超人和强力意志，例如尼采，许多人奉行终身的独身主义和牺牲精神，献身于事业和精神境界的追求。这种精神追求使得德国哲学表现出明显的民族特征。其次是很强的哲学思辨能力和形而上学传统，例如康德和黑格尔，一生致力于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也就是形而上学传统下各个知识体系的建立和完成，例如康德的三大批评理论，和企图建立各门学科的形而上学以便回答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又如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以及小逻辑、美学史等，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种独立创造的精神和设计体系的能力，使得不少学科的最初雏形是德国人提出的，例如，狄尔泰率先提出与自然科学相对立的精神科学（文化科学），不仅上承传统人文主义和古典学传统，而且为其后的人文学科的建立开了先河；冯特率先提出民族心理学，为今天的文化心理学和跨文化心理学奠定了学科认识的理论基础，等等。

与上面两种倾向截然相反的是另一面，那就是德国人具有极强的行动能力和关注效果与实现目的的倾向。这种倾向影响着德国人对技术的苛求，和鉴赏细节的习惯心理，这就部分地解释了何以德国的自然科学和技术实力在

某些方面领先于世界的事实，例如光学仪器和医学，及军事科学等方面。总之，除了超越社会与自我的强大的内在驱动力之外，一方面是哲学和思辨能力为创造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创作源泉，另一方面，技术和行动能力则进一步为知识找到了价值实现的途径和手段。甚至在社会能力方面，德国人的守纪律和善合作，也是理性思维和行动能力相协调的表现。所以这些，对于德国的学术思想和翻译理论研究，有着密切而直接的关系。

其次是关于德国功能学派的直接的哲学基础和研究的核心理论问题。如果说德国的精神追求是形而上的和决定论的，那么，这一民族的行动能力倾向则要求一种关注人的行为方式与人际关系的行动哲学。行动哲学和流行于英美的行为主义不同。有着经验主义传统的行为主义是刺激—反应模式的，容易强调外界环境的影响而比较忽略人的意识和目的，而体现原始内驱力和行为意志的行动哲学则强调人的活动与行为的自主性和主体性原则。行动哲学把人的行为（行动）分为无意识的或有意识的，单向的或双向互动的，人与人之间的还是人与物之间的基本关系。这样，这三个维度中的后三项就构成人际交际行为模式，进一步分为文化内的和跨文化的交际行为，有无协调（中介者），有无源文的等，然后再以源文和中介以及跨文化为必要条件，最终确定为口头的与书面的翻译行为，等等。可见，行动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功能主义翻译观的基础，就是因为它已经纳入到跨文化的交际模式之中，具有系统论的充足的范围和目的论的要旨了。

如果说在西方的行为科学研究中，人与动物行为之间的比较是人类行为的实验科学的学科基础和延伸的话，那么，在目的论的翻译观中，希腊哲学的目的论（teleology）则先在地为德国功能学派的目的论提供了理论基础（须知追溯希腊式的思维是德国哲学以至于整个欧洲哲学的共同的用之不竭的源泉）。哲学上的目的论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宇宙本体意义上的目的论，指的是宇宙万物的存在和发展有一定的内在驱力和行为指向，最终统一到一个总体的局势和方向上。外在的目的论则试图从宇宙万物以外寻找原因和目的，例如哲学目的论认为是上帝赋予宇宙以秩序和目的。另一个才是人的目的，也即是人的存在论意义上的目的论，并考察人的目的是否符合世界的或自然的目的。德国功能学派的目的论显然属于后者。但在将人的行为分成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时候，在将人的行动确定为有目的的行为的时候，显然有可能忽视人在目的行为中也有无意识和意识的共同参与，而在一味强调人的行为的目的性的时候，也难免有强调过头的可能，以至于会表现出主观的唯意志论的倾向。

按照这样的观点，翻译就是人的有目的的、有中介的、跨文化的交际行为，它可以是口头的，即口译，也可以是书面的，即笔译。然而，当我们把视线由主体移向客体，在翻译领域，即从译者移向文本的时候，目的论翻译观就要正式拉开序幕了。我们知道，在创作和翻译领域内，目的论涉及原作创作的目的和译作翻译的目的，这两者在原则上是有区别的，但也可以有联系，因此，翻译的目的论是建立在创作的目的论的基础上的。不过，一个根本的客观上可以看得见的东西就是文本的类型，而文本类型的划分可以按照形式进行分类，也可以按照内容或交际功能进行分类，在形式符合交际目的和内容统一到交际目的的意义上，文本的类型就体现为人的交际目的的实现形式。不过，传统的翻译观比较重视或者更多地强调源文目的，也即作者的创作目的的实现价值，这即是忠实论的翻译观，即便不算中国的不分文体和文类的翻译忠实论，起码在区分文本类型的翻译理论中，例如在纽马克的翻译理论那里也是有所表现的，而功能学派目的论的翻译观则强调译者的目的性，即翻译目的或译文功能的实现使翻译过程和处理手段合理化、合法化，于是，就有了德国目的论的翻译观。这样一个从源文目的（忠实）到译文目的的转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传统译论向现代译论的转移。至于“忠实+功能”这样一种翻译观的形成和表述，正说明至少在逻辑上，尚未彻底完成这样一个转变，甚至可以进一步推论，由于翻译的中介性质，从根本上影响着这一转变的彻底性。因此，也可以说，德国功能学派的翻译观，不能算作是彻底的翻译观。何以见得呢？

其一，如前所述，德国哲学的主流是形而上学倾向和唯心主义哲学，要求一种客观现实世界与主观观念世界的彻底决裂和对立，而功能学派的目的论由于它的行为意志和实践指向，并不能彻底实现这一二元对立的概念分离，所以，它的理论注定是不彻底的。其二，行动操作与技术定向的中介性质，在前提和潜力上限制了这种彻底的实现，因为这种理论的要点既不是自上而下的理论先行的理论形态，也不是自下而上的实践定向的即经验主义的理论形态，而是具有折中性质的理论定位。其三，教学定向的翻译理论，虽然具有理论研究的性质，但其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研究翻译理论，而是培养翻译能力，这样，就和行动哲学的基本观点相一致了，也和翻译教学培养翻译能力的目的相符合了。而其中的理论，无非是两种情况，或者对翻译教学的理论总结，旨在说服或影响学生接受某种翻译培训方式，或者对翻译过程与性质进行理论探讨，旨在说明某一翻译理论原理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综上所述，德国功能学派的目的论翻译观的要点有三：一是行动哲学，

二是目的译论，三是功能实现。因为前面两点都已谈过，这里只想就第三点做一点说明。所谓功能主义，在渊源和原则上是和结构主义或本质主义相对应的概念。要而言之，前者的理论假设是，事物的本质隐藏在其特殊的结构之中，可以通过内部分析或反思的方法进行研究，而功能主义则放弃对于内部结构的机械分析，并反对内省的心理方法，转而寻求从事物的外部，即从一事物与他事物的联系方面（不等于辩证法所谓的事物的普遍联系），考察该事物的对外作用或其功能的实现的。这样，功能主义就和传统的本质主义有了哲学上的分别。在这个意义上来认识翻译上的功能主义，就可获得以下四个方面的认识：

第一，人的本质就是人对于环境的认识和作用，也即人的适应或改造环境的功能的实现；同理，译者的功能即是在翻译活动的操作过程中，实现其对于原作价值的转换的体现和译作价值的潜力的实现。第二，文本的类型，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一定的交际功能，所以不同文本的创作和翻译都具有功能实现的价值。这样，对于翻译而言，每一文本功能的实现，都是一个翻译过程的完成和某一种翻译价值的外部实现。第三，功能是可以划分的，并可以结合为一个总的网络，例如，文本的功能是可以划分为不同层面与角度的，而人与环境相对的功能也是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切入点和效用的。这样，总体功能的实现则有待于各种功能的配合和完善。第四，如果把翻译看做跨文化的、有中介的、有目的的交际过程，那么，翻译的有效的和最终的完成，就有待于各个方面（即不同功能体，其中包括作者、译者和读者）的综合实力和相互配合，才能最终完成。因此，可以说，一种完善的功能主义的翻译理论，同时也就满足了一种比较完善的系统论的要求和条件。

三

那么，如何实现学术上的有效的传承与在真正意义上实现超越？这一问题也可以转换为：在今天的翻译学科的学术语境下，在中西跨文化交流的特殊语境下，如何理解功能主义目的论翻译理论的出现和发展，以及对于我们有何启示呢？关于这一问题，我以为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是技能意识。翻译是一种行为或行动，大而言之是一种活动，具有可操作性、过程性、技能性。它在原则上不是一种知识或理论，而是一种生产活动或再生产活动，有产品和效果，其质量可以检验和评价。多年前，刘宓庆教授就曾写过一篇论文，论述翻译的技能意识，但在国内引起的反响不大。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究其原因，理论的强烈导向是一种影响因素，忽

视技能和实践则是另一种因素。例如在哲学上，一面跟上西方的后现代思潮拒斥和反对形而上学，一面又学西方大哲的口气从形而上的高度贬低实践和技术。于是会造成两个方面的认识偏差。这是值得提醒和反思的。从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德国功能主义的目的论翻译观，在聚焦于人的行动的时候，无形中突显了技能，也就是肌体的机能，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在这个层面上需要有人关注，有人总结，有人花大力气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

第二是教学目的。诚然，功能主义目的论的翻译观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实践指向和教学目的。他们甚至提出了系统的翻译教学思想，例如，诺德认为翻译教学首先要培养学生运用母语进行创作和分析的能力，然后再把这种能力转化到外语上去。这是难能可贵的。相比之下，国内的翻译界，虽然大多数仍然是教师，一般不脱离教学，但真正重视教学的甚至从教学中提取研究问题，或把教学经验上升为理论的，或者将新的翻译理论和观念引入教学的，却不是很常见。有的翻译理论研究人员甚至不能教授翻译课程，或者没有任何的翻译实践基础。诺德等人的思想使我们想到，翻译研究与教学的关系可能有两种：其一是使新的翻译理念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实践目的或教学指向，包括相关的语言观点和哲学观点，继而提出新的翻译教学思想、培养途径和训练方法等，直接促进翻译教学。其二是将一种翻译理论，包括它的基本理论（纯理论）用以映照翻译实践层面，或将其应用理论（或者这一理论的应用部分）延伸到翻译教学的实践中去，为改革翻译教学提供理论的动力和思想资源。在这两个方面，德国功能主义目的论的翻译观，都有其明显的贡献，他们甚至把文本分析和翻译批评与翻译教学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丰富而深刻的翻译教学思想，而不是先把翻译教学或实践架空或抽空，以便去从事所谓的理论研究。

第三点要走得远一点，是关于一种真正好的翻译理论，它会是什么样子的？这样说当然不是要给理论下定义，而是尝试以非理论的语言来描述翻译理论。我觉得一种真正的翻译理论，必须首先符合一般理论的要求。不是好的理论，就不能够成为好的翻译理论，也不存在翻译理论低人一等的问题。其次，好的翻译理论在基本原理上必须具有必然真理和普遍实用的性质，原则上不存在只适用于西方而不适用于中国的翻译理论（谈具体策略和方法的理论除外）。以语言和文化差异为借口或无限夸大语言差异和文化的特殊性，企图否认存在普遍的翻译理论，乃是理论上幼稚的表现；或者脱离实际和基本问题而谈理论创新，或者根本没有建立普遍理论原理的企图，都不可能真正的理论建树。再次，一种基本上完善的理论，或趋于完善状态的理

论，只要它的基本原理是独创的，理论是自明的，陈述得比较清晰，就一定有可以应用的层面，例如对于教学实践、翻译批评、质量评估，不能只强调某一方面的应用价值（或价值不明显），就否认其理论价值，也不能一强调理论价值，就认为和应用无关。最后，没有不能批评的理论和不经受理论检验的理论，但是批评要讲学理，而检验则是十分复杂的事情。有些理论不是应用性的，就不能只用实践进行检验，也可以用逻辑检验其是否完善，也可以用思辨反思其理论基础，分析批评其哲学观点，但这些都是学理性的，而非历史性的。用历史经验来检验或说明真理，是困难的。因为历史本身过于复杂，也不是一种理论可以说明得了的。

四

对于我们中国的翻译界而言，如何正确的理解和接受西方的翻译理论，是关系到如何传承与超越的根本性的问题。在这一方面，不仅要全面认识西方的学术传统和某一流派的哲学基础，而且也要注意不同的民族性格和学术传统。另一方面，也要深刻认识自己一方的情况和需要，包括民族的和个人的，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和“深刻的解剖自己”，就是这个意思。笔者经过近年来的观察，发现在翻译理论方面，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理论，我们都习惯于提出一些一成不变的问题，或者与这种特殊理论的核心和要点不甚相关的问题，企图在对方的回答中得到现成的、肯定的结论。在分析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发现存在着一些妨碍我们接受西方思想的若干先见和认识盲点。不妨陈述如下，以供参考：

急于寻找一种新的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理论，发现不是便弃若敝屣，是其一。大体说来，这既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甚至盲从的心态，也表现出对于理论和学术的实用主义态度和肤浅的认识水平。究其深层原因，除了缺乏对于学术的终极的认识以外，也许还有正统思想和相信存在唯一的正确的理论模式的观念在起作用。例如，当年对于奈达理论就抱着这种态度，为了不顾一切地否定自己的传统译论，一时间似乎找到了救星，或者视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后来，发现不是这样，原来“动态对等”不是一种理想的模式（相对于解释学等新观念），而又可以给其冠上“结构主义”的帽子，于是便不屑一顾，弃若敝屣了。同样，语言学（符号学）翻译观、解释学翻译观、结构主义翻译观、解构主义翻译观，都先后遭到过类似的命运。只要对于功能主义目的论的翻译理论也抱着同样的态度，认为它可以解决一切和翻译有关的问题，或者能简单地回答一切理论问题或实践问题，就很容易以希

望开始，而以失望以至于无望告终的。

认为一切研究都落实到要有一种万无一失的标准，可以之判断一切译文而无疑问，是其二。可能是中国传统译论的翻译标准为核心的遗风在作祟，也可能是一种习惯的实用主义的心态和固执的陈旧的问题意识在起作用，总之是影响了翻译的研究视野和理论概括的范围，不少人都会提出一些幼稚的问题：你这个理论听起来很有道理，可是能解决翻译问题吗？或者能指导翻译实践或者改进译文质量吗？倘若不能，至少也可以提出一种标准，用来替代传统的“信、达、雅”或“神似形似”，以便能够判断一种译文是好是坏，并据以反过来判断一种理论是否有效或者最好是永远有效。

把文学翻译看做翻译的正宗和最高形态，过分强调其特殊性与难度，是其三。在学界，可能由于文、史、哲，特别是文学的强大传统，影响到文学翻译的教学比例和出版数量占有优势，或者以文学翻译家为真正从事翻译活动者，许多人把文学翻译视为最高的翻译形态，或者最难的翻译类型，甚至最典型的翻译活动。因此，一提某一种翻译理论，就要问人家能否解决文学翻译的问题，倘若不能，就认为没有用。一个深层的推论性认识，可能是认为翻译理论是科学，和科学翻译、应用翻译比较接近，而和文学翻译距离比较遥远，甚至认为文学翻译在理论上说不清楚。进一步而言，就是把文学翻译神秘化、困难化，或者用自己也不明白的问题来考对方，使人难以回答（殊不知功能主义目的论的翻译理论，早已深入到文学翻译和翻译批评的领域里，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诚然，以上几点认识并非可以穷尽我们所存在的问题，也许还有更多的未及言说的主客观因素，有待于我们去发现，去说明，去克服。但是，只要我们还在思考如何才能翻译的学科建设中确立中国学派的独特贡献，传承与超越的问题就永远是根本性的问题。因此，我认为，卞建华的论文题目涉及传承与超越，是意味深长的。在这篇论文作为专著出版的时候，我不能给这个足够大的题目增加什么，只能将它具体化、问题化，由此构成我这篇序文的题目：“何谓有效的传承，如何真正的超越？”

我相信，在如何传承人类古老的文化传统和先进的文明成果方面，在如何有效地超越自身和克服自身的缺陷方面，或者具体而言，在如何研究翻译的种种问题和建立更好的翻译理论方面，有一种形势和压迫感对于我们是共同的，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和计划。我们所缺乏的，和我们的西方同行相比，实际上未必是学术传统和对于传统的态度，也不一定是具体的研究基础和物质条件，毋宁说有一种认识，还没有在我们中间形成并产生

影响。在面临这样的认识的时候，也许我们的欧洲同行，特别是德国的学界同仁，已经早就走在了我们的前面，并给我们发出了警示的信号：

虽然这些计划有很多要点上各不相同，然而它们有一个统一的信念，即哲学思考必须从尚未实现的东西所激发的希望中汲取力量，同样也必须从已经实现的思想所激发的希望中汲取力量。因为只有超越经验主义的经验界线，理论才能使当下的生活去面对被它否定的、负罪的现实理想本身；如此一来，作为启蒙辩证法的最后阶段，思想就把自己在降格为自然科学谦卑的婢女时所放弃的领地和相关性，重新又赢了回来。也许在这条道路上，哲学探索的努力更多的不是为了实现不可能性，也不是为了在思想中超越其时代，而是为了给那个时代提供强制性的理由，去超越自身的局限性和盲目性（《瓦尔特·本雅明救赎美学》，理查德·沃林著，吴勇力、张亮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黑体是笔者所加，以示重点和强调）。

愿此言论和思想能引起学界同人关注。

王宏印

2008年中秋节

草于南开大学龙兴里寓所

Preface

Skopos theory was first formulated by the German scholar Hans J. Vermeer in 1978. Drawing on the action theory of the Finnish philosopher and logician, cultural critic and essayist Gerog Henrik van Wright (1916-2003), Vermeer developed his theory of translation as an intentional action guided by its purpose. Another translation scholar investigating translation from a similar perspective was German-born Justa Holz-Mänttari in Finland, and the first followers of this line of thought, who applied *skopos* theory to translator training (like Hans G. Hönig and Paul Kussmaul) were Germans, too. From Germany, the idea spread to a number of European countries before it was taken up in South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where it fell on fertile ground. It is evident that, although formulated as a *general* theory of translation, functional approaches have to be regarded as a product of genuinely Western thought, developed and applied in Western countries to Western languages by Western scholars who did not know or care much about Asia in general and China in particular, with its long and rich tradition in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about translation.

Therefore, it is quite surprising that *skopos* theory and the successive functional applications have been welcomed so warmly in translation-related circles after they were first introduced to China in the late 1980s. In a way, the phenomenon reminds me of what happened in South Africa little more than a decade ago when functional translation was considered to be the only possible way to cope with translation between eleven official languages. But then, in South Africa the problem was that nine of the eleven official languages are African languages that have not yet developed sophisticated terminologies in many areas of society (like banking or social security), and still the government's anti-discrimination policies enforced translation of all public documents not only into English and Afrikaans but also into at least two of the African languages used in the respective regional State. This cannot be said of China, which, moreover, traditionally has had a strong focus on source-oriente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Maybe it is just that functional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appeal to common sense? We know that in our daily lives, all our actions are determined by the purpose we want to achieve, and why should translation be an exception? Maybe it is because translation theorists have finally start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ofession, where equivalence-based or source-oriented translations very often do not succeed in achieving the effects or purposes desired by the translator's client. Maybe it is the attraction of something new and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way of looking at translation that rouses the interest of scholars in this fast-developing part of the world? This last aspect would explain why many Chinese scholars (similar to quite a few critics in the West) seem to overemphasize the adaptive tendencies in functional approaches.

Whatever the reasons are, in my first lecture tour through various Chinese universities at Hangzhou, Beijing, Tianjin and Qingdao in early 2007, I was overwhelmed by the interest shown by students and teachers. Their questions were very much to the point and always included the following aspects: Is *skopos* theory apt to deal with literary translation? What about preciseness in functional translation? How do you assess a translation according to functional standards? Does functional translation prefer adaptive strategies?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ugene A. Nida's functional equivalence and a functional translation?

In view of these questions it seems absolutely necessary to make the foundations of *skopos* theory and functional applications more widely known to an interested Chinese audience who may not always be able or prepared to read the basic texts in English or even German.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book is precisely to "mediate" between West and East, to explain how *skopos* theory came to China and what happened to it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sinicised. It is my sincere hope that this book will contribute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ranslation scholars in East and West, from which all of this will benefit in the end.

Qingdao, March 2007

Christiane Nord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选题原因及意义	(1)
第二节 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概述	(5)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6)
第四节 研究目的、研究方法 & 主要创新点	(10)
一 研究目的	(10)
二 研究方法	(12)
三 主要创新点	(13)
四 基本研究思路及研究的局限性	(13)
第五节 相关概念界定	(15)
一 关于翻译	(16)
二 关于语言功能、文本功能和译文功能	(17)
三 关于功能学派/目的学派	(19)
四 关于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和 skopos theory 的归属 和译名	(22)
第二章 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的理论渊源和学术背景	(25)
第一节 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产生之前西方翻译界的研究状况	(26)
一 20 世纪以前具有功能主义倾向的翻译观	(26)
二 20 世纪上半叶具有功能主义倾向的翻译观	(33)
第二节 翻译理论的困惑与翻译实践的需求	(36)
一 翻译理论的困惑：语言学派的“等值”翻译观及其 局限性	(36)
二 翻译实践的需求	(42)
第三节 相关学科对翻译理论的影响和渗透	(43)
一 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的直接来源：行动理论 (Action Theory)	(44)
二 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的来源之二：交际理论	

(Communication Theory)	(48)
三 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的来源之三: 接受美学 (Reception Aesthetics)	(52)
四 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的来源之四: 语篇语用学 (Pragmatics-based Text Linguistics)	(56)
小结	(59)
第三章 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代表人物及其理论范式	(61)
第一节 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的发端	
——赖斯的翻译理论	(61)
一 文本类型以及翻译批评模式	(62)
二 翻译批评的局限性及其影响因素	(70)
小结 赖斯翻译理论的贡献和局限	(72)
第二节 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的奠基	
——弗米尔的翻译理论	(78)
一 对翻译的重新定义	(79)
二 翻译指令: 决定翻译目的的重要因素	(83)
三 Skopos 及相关概念的含义	(86)
四 三项原则: 目的/连贯/忠实	(88)
五 现实中的翻译过程: 一个不可避免的变异过程	(92)
六 信息供源——源文在翻译过程中的地位	(97)
七 翻译标准的多元化: 适当 VS 对等	(101)
小结 弗米尔翻译理论的贡献和局限	(103)
第三节 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的发展	
——曼塔莉的翻译理论	(109)
一 译者行动——一个比翻译更为宽泛的概念	(110)
二 影响翻译行动过程的文本内因素和文本外因素	(114)
小结 曼塔莉理论的贡献和局限	(117)
第四节 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的集成	
——诺德的翻译理论	(119)
一 翻译定义再思考	(120)
二 翻译为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	(122)
三 “功能+忠诚”理论	(142)